

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建设的效率与公平

郝云 贺然

(上海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把制度建设作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战略,创新性地确定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建设内容,这是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步骤。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定位影响着国家治理的效果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基本经济制度评价的标准应该遵循唯物史观的逻辑和制度分析的逻辑。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有历史标准与价值标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首先要解决社会基本矛盾,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可以称为效率标准;同时也要最终体现人民的利益、共同发展的价值标准,实现社会公正。从制度分析的角度看,它也属于制度的一般,制度要实现有效的治理目标,也有效率与公平的判断。因此,要使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能够充分实现其效能,既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在所有制形式和分配形式上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又要通过制度创新及经济体制改革,在实际中发挥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在市场改革和企业改革过程中,做到综合考量、动态调整、均衡发展、避免模式化和静态化的倾向,不断使其历史逻辑与价值逻辑、效率与公平统一起来。

关键词:基本经济制度;治理能力现代化;效率;公正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20)05-0043-08

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制度建设作为我国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明确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出的新概括。习近平多次指出,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因此,制度建设是战略性安排,制度的有效性对提升治理能力具有重要作用,既有利于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又有利于解决社会基本矛盾、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理解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并提升其在国家治

理中效能的发挥,就要充分认识基本经济制度的价值。效率标准和公平标准是判断基本经济制度价值性和有效性的两个基本维度,而对基本经济制度效率与公平的认识是判断其“制度善”的前提条件。

一、基本经济制度的效率与公平分析

对基本经济制度的效率与公平分析既要遵循唯物史观的方法,又要从一般制度分析的维度入手。这是因为,一定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反映,它决定了其他经济制度,基本经济制度的合理性评价应该遵循唯物史观的原则。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善标准要有利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同时还要有价值标准,符合人民利益原则以及实现

收稿日期:2020-04-12

作者简介:郝云,男,湖北公安人,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共同富裕的目标。另一方面,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又要遵循制度的一般规律,遵循制度的合理性标准,效率标准与公正标准是制度的价值所在。因此,就我国基本经济制度而言,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相一致的,追求的是经济发展和人们富裕的统一、经济性与人民性的统一、经济标准和伦理标准的统一、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从唯物史观来看基本经济制度的效率与公平,一方面,要认识到社会基本经济制度不同于一般的法律制度、道德规范,它首先属于经济基础而不是上层建筑,反映的是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和产品的分配状况可以推动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影响经济效率。同时,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及由此决定的分配方式决定了制度本身的公正性。因此,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效率取决于其是否适合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基本经济制度的公正性取决于所有制和分配制度是否与生产力相适应。另一方面,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在运行过程中,特别是在微观实践中,也有效率与公正的评价标准。在同一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的条件下,不同的表现形式、结构模式所体现的实际效率和公正性是不一样的,这就不能简单地用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的定性标准来确定。因此,变换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的适当形式,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从而使制度更适应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十分必要的。

作为制度的一般,要进行制度内在价值的分析。在制度的效率与公正关系的研究中,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有不同的观点和方法。如制度经济学主要以制度的效率为研究重点,产权经济学也探讨了何种产权更有利于效率。在制度经济学看来,制度是一种社会资本,是一种稀缺资源,是可以用来创造价值的,其主要功能是增进效率。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把制度看作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是需要主动设计

和选择的,而不是如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制度、规范、道德是市场经济自由竞争自然产生出来的结果。他们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制度的构成和运行,阐述了制度因子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实现了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革命。他们认定制度的改革、变迁能够带来经济绩效。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政治哲学家们则从公正的角度认识制度的价值,认为制度的首要价值是正义,“从理想方面看,一部正义宪法应是一个旨在确保产生正义结果的正义程序。这个程序应是正义宪法所控制的政治过程,这个结果应是被制定的法规主体。而正义原则为这两者提供了一种独立标准。”^[4]他还把制度理解为一种公开的规范体系,这一体系确定职务和地位及它们的权利、义务、权力、豁免等等。然而,罗尔斯并未重视制度的经济效率问题,也未探讨社会基本制度和生产方式对制度公正的影响,而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善基础上去谈公正问题的,显然,这不能完全作为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公正的标准和基础。

在以往的社会经济制度中,效率与公正价值是难以统一的。首先,基本经济制度受不同阶级利益的驱动,很难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在古代社会,各个时期的统治者考虑的是用制度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亚里士多德提出“人是政治动物”,为了满足各自利益的需要组成了城邦、国家。虽然他强调公正的重要性,但这个公正只属于自由人。霍布斯的“自然法”理论强调通过相互签订契约让渡一部分权利来保证公正的权利,而为保证履行契约,则须通过仲裁者——君主来维系,而君主有自身的利益,这就使得公正难以保证。黑格尔在《论法的精神》中虽然强调法在维护公共利益方面的作用,认为法的精神在于法作为理念的自由,是自由这一绝对概念的定在。作为制度的存在,必定是脱离了单个人特殊的、带有“任性”的私欲,而转向对

共同利益的关怀。然而,这种制度的前提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马克思认为,制度不能仅仅归结为社会普遍意志的法律和伦理范畴,对社会制度进行研究首先要研究作为整个社会制度基础的生产力以及由此决定的生产关系,然后才能研究在此基础上的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与道德。在既有的私有制条件下谈公正,那是抽象的公正,这个公正即使被考虑到,也是没有实质意义的。马克思批判了撇开经济关系抽象地谈分配公平的观点,“难道资产者不是断言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吗?难道经济关系是由法的概念来调节,而不是相反,从经济关系中产生出法的关系吗?难道各种社会主义宗派分子关于‘公平的’分配不是也有各种极不相同的观念吗?”^[2]马克思这一连串的诘问实质上揭示了离开了所有制的抽象公平观的局限性和虚妄性。如果不能解决所有权关系的初始分配正义问题,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正。

其次,统治者由于有自身的利益在其中,往往设计出无效率的产权制度。换言之,如果制度的效率对其不利,它会维持制度的低效率。因为制度设计的主体和动因的不同会影响到制度创新的动力及制度的效率与公正,在阶级社会里更是如此。诺思的“政府悖论”就揭示了在阶级对立的社会里统治者与被统治阶级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他关于国家起源的“暴力潜能”分配理论认为,国家具有契约和掠夺的双重属性。国家的基本作用是界定和行使产权,且具有天然的垄断性,但国家同时又是追逐自身垄断租金最大化的行动集团。有效率的产权制度的确立与统治者的利益最大化之间存在着矛盾。从自身利益出发,统治者往往可能维持或建立一套无效率的产权制度。他就此认为,制度是效率与公正作用发挥的前提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再次,有效率的制度不一定公正。在有些以功利主义为哲学基础的福利经济学那里,由于只注重经济的总量目标而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比较等公正目标,有的经济制度还是以不公平出效率的。虽然这种制度安排在一定时期能使经济得到发展,但长期来看是有损于公正和效率的。即使是公正问题的考量,但也由于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的差异,往往片面强调某方面的正义而忽视另一方面,这也是忽视公正的表现。如新制度经济学大多强调程序性的公正而非结果公正。程序公正要求不分种族、宗教、贫富或亲疏地保护同等的基本权利。程序正义的制度要维护的是人的“消极自由权”,即免受非必要的、不平等的约束和侵犯的权利,而不是“积极自由权”。这在标准上要求约束以同样的尺度适用于所有人,不问其阶级和身份;在经济生活中,凭自己的资源进行竞争;在实践上,要求法治而不是人治。柯武刚等说得明白,“法的这一目的在于确保所有公民都能享有按其个人自由意志行事的同等机会,而不会受到不必要的法律限制。这就是程序公正。这是唯一能由政府来保障的公正;结果的平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得到保障,因为机会影响着结果。说确保结果平等的社会公正不可能靠政府来保障。”^[3]政府的古典角色仅仅是维护法律与和平,当政府被赋予一种再分配职能时,它会因此而不按照形式平等的原则对待所有公民,个人自由权和法治就处于被削弱的危险之中。这一观点也是许多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通过对结果公正的忽视甚至否定,可以看出制度设计的效率标准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保效率与公平的内在一致性

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注重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又注重公平,并且可以达到效率与公平的内在统一。

首先,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确保效率与公平的内在一致性的决定因素。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石,是制度效率与公正的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上层建筑的变革。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如果动摇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那么必将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确保了生产效率的提高。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建立的基础和根本任务。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灭亡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无法解决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因此,无产阶级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4]。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如果不发展生产力就会出现“贫穷的普遍化”,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建立的基础和根本任务,社会主义能够代替资本主义正是因为社会主义能够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有发展生产力才能推动社会向更高形态演进。

当然,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有待提高,这决定了我国无法实行单一的所有制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鼓励并支持私有经济的发展。对于经济体制的效率问题,产权经济学也提出了他们的观点,从另一个角度承认了所有制的具体构成形式是需要不断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化作出效率的衡量和判断的。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变迁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科斯定理发现了交易费用及其与产权安排的关系,提出了交易费用对制度安排的影响,

为经济行为中作出制度安排和决策提供了帮助。根据交易费用理论,市场制度的使用是有成本的,一切制度安排的产生及其演变都受交易费用的影响。制度的效率在于比较不同制度交易费用的成本与收益所得。产权制度理论分析产权制度的效率,研究何种产权制度有利于效率的增加,用以判定产权制度的价值。当然,他们的有些观点是不正确的。与私有产权高绩效的观点相反,社会主义公有制在许多方面体现出优势,反映着高绩效特征,且和私有制共同发展。

其次,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是确保效率与公平内在一致性的直接因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确保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公平性。马克思主义认为,分配制度的效率与公正由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决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决定分配制度的形式。有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就有什么样的分配制度。从分配关系来看,在阶级社会中,各个阶级、个人或集团的利益是通过分配来实现的。马克思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5]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所有制关系条件下,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财产占有关系是不合理的,不仅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不能得到真正实现,与资本家阶级集团的利益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冲突,而且各资本家集团之间也存在着根本的对立冲突,此时分配制度就失去了真正公正性的基础,并且由于失去了激励因素,因而必定是缺乏效率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了实行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6]社会主义公有

制确保了劳动要素参与利益共享的权利,为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实现奠定了制度基础。

按劳分配作为公有制条件下的分配制度,其公正性就在于它的分配去除了私人资本的因素,在资本公有的前提下避免了资本与劳动的地位不平等,这是解决分配制度公正性的重要路径。当然,并不是按劳分配都是平等的,按劳分配由于劳动力的差异性和禀赋的不同也会造成分配的不平等。同时,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好处在于,它使分配反作用于生产,有助于调动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再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确保效率与公平内在一致性的重要保障。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看,市场经济从辅助作用到基础作用再到决定性作用的过程,是逐步理顺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过程,它提高了经济制度的效率和公平的程度。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历程就是在公正与效率关系不断调整中逐步趋于合理化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证了效率与公平的均衡发展。十九届四中全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既肯定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效率标准,又符合社会主义注重公平的特征。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形成经历了从试行到逐步完善的过程。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看到了市场价值规律的作用;十二大提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辅助性作用”,肯定了市场的作用。十四大报告首次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八大进一步提出,“要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八

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看得见的手”完全从微观经济领域退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顺对市场作用的发挥、对市场效率与公平的实现具有重要作用。在资源配置方式方面,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破除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对立的思想教条,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把有效的市场机制和有度的宏观调控结合起来。总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是在革命、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形成和确立的,是被实践检验拥有巨大优越性的制度,既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又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

作为主导我国发展方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基本经济制度设计的效率与公正价值的推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诺思看到了成功的意识形态对提高人的积极性、提高效率以及促成公正制度建立的作用。他说:“如果主导的意识形态试图让人民将公正想象成与现存规章同样久远,进而从一种道德意义上服从这些规章,那么一种成功的、对立的意识形态的目标则是让人民相信,不仅明显的不公正是现存制度固有的一部分,而且一种公正的制度只有通过个人积极参加变革制度才能产生。”^[7]成功的意识形态不只是能让人们对现存制度(即使不合理)认可,更重要的是要使大众认识到通过制度的变革使不公正的制度变为公正的制度,以维护更高、更大的利益。

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总体方向的确定性与具体运用的动态性和即时性是统一的。制度

的改革和创新与治理能力的提升同样重要。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归功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对外开放,并不断地打破固有僵化的体制和思维惰性,尤其是顶层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起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经济制度特别是有利于社会治理的经济制度应该是既追求效率的提升,同时也要有利于社会的公平。

可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体制的效率与公平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并且与所有制、分配制度、经济制度等是紧密联系的。撇开所有制和分配制度,制度的效率与公正标准就无法谈起,效率与公正的标准必然是抽象的;如果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的评判缺乏与具体经济实际的联系则是僵化和教条的。

三、将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能力的提升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能够确保效率与公平的内在统一。当然,目前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在效率与公平问题上还未达到完全统一,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尚未得到充分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对非公有制经济认识的不断深化,我国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地位。非公有制经济挣脱了单一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获得了良好的经济环境和发展空间。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为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众多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提供了制度依据,调动了各生产要素的生产积极性,进一步推动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逐渐发展成为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创新发展的主要阵地、吸纳就业的主渠道,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效率的提高。但是由于非公

有制经济过分强调效率优先,造成了“资强劳弱”的劳动关系,使得劳动者成为较为弱势的一方,劳动报酬在非公有制企业中所占比重降低。特别是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的管理者通过低价购买企业成为了资本所有者,一部分工人则被低价买断工龄而失去工作,其中大部分工人进入非公有制企业就业。非公有制企业经营者拥有绝对自主权,大多数企业缺少工资的协商机制和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收入分配具有随意性且无法保证按时发放工资。企业主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被淘汰,往往忽视劳动者的利益,在降低企业成本追求生产效率时,把降低劳动报酬作为首要选择,造成了劳动报酬与资本收入的分配十分不平衡,资本收入不仅远远高于劳动报酬,并且在增长速度上也快于劳动报酬的增长。国有企业的收入除上缴给国家外,剩下的利润主要用于积累,而非公有制企业在扣除员工工资后,剩余利润全都归企业经营者所有,因此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私营和外资企业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8]随着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总资产中所占比重逐步提高,公有制经济比重不断降低;国有企业数量上所占比重低,发展质量不高,市场竞争力不强,劳动者收入不高。这些因素最终导致了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因此,要使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转化为治理能力的提升,从而达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就应该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促进生产力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经济目标和价值目标双重统一。邓小平从两个目标提炼出社会主义本质内涵。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9]这一论断从经济效率层面提出了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

产力”;从公平层面则提出了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并确定了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而此目标的实现是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基础之上的,这就避免了两极分化和不公平的结果产生。他还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10]总之,要使效率与公平达到内在统一,就要充分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并发挥制度优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在此基础上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

其次,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上不断深化改革,包括改革所有制的形式、分配制度以及市场机制,使其更有利于效率的提高和公平的实现。从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经验看,以所有制和分配制度改革的生产关系的变革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优越性。然而,经济的发展也经历了生产力大发展而贫富差距拉大的过程。因此,在改革的实践中我国的分配制度也经历了不断调整的过程,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注重效率与公平”,就是根据各个时期的发展状况进行的调整,以做到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不断适应。

再次,按照新时期共享发展理念来推进公平的发展。共享发展包括共享与发展两大主题,注重经济发展与共享两种目标,二者是有机统一的关系,是全面共享、全民共享、共建共享和渐进共享的统一。经济共享包括国家、企

业和个人共享,中央和地方共享,东部、中部、西部共享,资本与劳动等生产要素共享,工人与农民共享,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共享。要在共享的前提下,实现各行业、各群体、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共享,要有特殊的倾斜政策。共享发展注重的是公平的发展,是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它要求从源头就要公平。发展机会的共享就是要使广大人民都有平等参与发展的机会。这就要求必须做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发展依靠人民;充分调动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形成人人有责的责任担当,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以及人人共享的公平结果。

最后,加快所有制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促进效率与公平统一的重要手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11]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一方面坚持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增强了国有资本在社会总资产中的优势,为公有制经济注入了新鲜活力,提高了国有经济的灵活性和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另一方面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发挥公有制经济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示范作用,提高劳动者的地位,让劳动者拥有分享劳动创造的企业剩余的权利,减少企业对劳动者的剥削,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实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效率与公平统一的必然要求。一是从制度层面保证国有资本、民营资本的平等地位,加强制度顶层设计,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建立负面清单制度。二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利益共享公平分配机制,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市场化选聘职业经理人,完善混

合所有制企业利益分配制度,从而有效解决国有资产流失严重、民营企业平等地位难以保障以及利益分享机制不完善的公正性问题,最终通过这些措施,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持久健康发展扫清障碍,保证过程的公正性以及结果的公平公正。

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的攻坚期、深水区,制度性障碍是影响改革向纵深发展的主要问题。所有制度、分配制度、市场机制、企业制度以及各个部门、行业的制度改革都需要有宏观、长远、前瞻性的眼光,基本经济制度设计既要考虑效率的增进,同时又要注重公正价值标准。只有深入研究、多方设计、充分竞争、慎重选择、均衡考量,才能发挥制度的效力,为改革发展提供高水平的制度资源,也必将大幅提升我国的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参考文献:

- [1]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195.
-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2,436.
- [3]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94.
-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
- [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7.
- [7][美]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5:68.
- [8]卫兴华.遵循共同富裕的原则促进分配公平[J].新视野,2013(9):22—24.
- [9][10]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73,364.
- [11]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98.

[责任编辑 杨年保]

On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Basic Economic System

HAO Yun HE Ran

(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entral Committee clearly regarded system construction as an important strategy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and innovatively determined the construction content of China's basic economic system. This is an important step in transforming China's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into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The positioning of China's basic economic system affects the effectivenes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the level of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The standard of basic economic system evaluation should follow the logic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logic of system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re are historical standards and value standards. China's basic economic system must first resolve basic social contradictions, so that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 can be fully developed, which can be called the efficiency standard; at the same time, it must ultimately reflect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the value standard of common development, and achieve social jus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analysis, it also belongs to the general system. To achieve effective governance objectives, the system also has efficiency and fair judgment. Therefore, to make China's socialist basic economic system fully realize its effectiveness,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ublic ownership as the main body and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work as the main body, and to reflect the essen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form of ownership and distribution. Through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system reform, the role of the market economy system is brought into practice. In the process of market reform and enterprise reform,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dynamic adjustment, balanced development, the tendency to avoid modelization and staticization, and to continuously make its historical logic and value logic,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are unified.

Key words: basic economic system;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capacity; efficiency; justice